

•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 •

事件与爱：当代西方激进左翼思潮的本体论重构^{*}

莫 雷

【摘要】当代西方激进左翼思潮将事件与爱承诺为本体。为了建构新的存在，他们引入“事件”概念打破结构化的旧秩序，彰显主体的能动性，并通过情感的转向凸显“爱”在创造新的共同性和对共同性的新感受中的纽带作用。事件和爱作为不能被理性化的形而上学体系所容纳的裂隙具有本体的意味，可以在裂隙之中打破封闭的本体，通向看似不可能的新存在，建立起尊重异质性的共同性。因此，他们所理解的本体既拒斥绝对同一的实体论，又未走向相对主义。这种能动的本体论有助于从否定性和超越性的角度重新把握存在，为人们打破资本主义秩序提供新的可能性空间。但是，事件和爱的偶然性和神秘性又使得他们对本体和主体的建构明显不足，本体只能成为缩减的本体，而主体也只能变为有限的浮现。

【关键词】当代西方激进左翼 本体 事件 爱 **【中图分类号】** B516.5

当代西方激进左翼思潮的代表人物巴迪欧、齐泽克、奈格里、阿甘本等人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策略虽然力图解构本质主义，消解中心和必然性，却没有完全走向相对主义。他们仍然竭力去发掘不确定性和多元性之下的普遍性和共同性。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共产主义的重新解读蕴含着他们对新秩序和新的可能性的探索，而这种探讨必然要依赖哲学层面对存在、真理、主体的重新思考和建构。如巴迪欧提出“数学=本体论”的论断，力图以集合论的逻辑探讨事件哲学；齐泽克以他对拉康和黑格尔的重新解读关注事件与总体的关系；哈特和奈格里关于诸众的自我生成和自我创造的理论源自他们对斯宾诺莎本体的重新解读；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背后有海德格尔及其弟子的生存论的痕迹。虽然他们在研究本体问题时的侧重点和思路各有不同，但他们都是以本体问题为依托来研究政治哲学的。

国内学界已经有学者注意到这种特征，并将其概括为“激进左翼政治哲学向存在论的转向”（尹树广）。他们不再关注传统的本体论问题即“存在之所以为存在”的本源和始基的问题，不再关心世界的统一性问题，而是关注新的存在何以可能即无中如何生有的问题。在他们看来，事件和爱通向新存在的两个本体概念。对事件和爱的理解不仅可以促进对本体问题的再思考，而且可以提供对主体和真理的新理解。本文力图对巴迪欧、齐泽克、哈特、奈格里、朗西埃等人的本体思想进行梳理，阐明事件和爱作为不确定性和偶然性的存在何以成为当代西方激进左翼的本体概念，分析事件和爱作为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西方激进左翼的元政治学研究”（编号17CZX009）的阶段性成果。

本体如何影响政治主体和政治策略，进而反思事件和爱能否作为本体塑造出新的普遍性和共同性，探究事件和爱作为本体可能存在的缺陷。

一、作为本体的事件

当代西方激进左翼的代表人物巴迪欧、齐泽克、朗西埃对“历史的终结”和资本主义永恒化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我们今天仍然有可能对资本主义进行根本的批判，并寻求一种全新的存在秩序。那么，哲学如何探寻这种全新的存在？齐泽克、巴迪欧、朗西埃等都不满意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案。在他们看来，结构主义有两个问题——“通过尊崇结构是一种坚韧的本体论常量以及通过将主体性贬斥为本质上是结构的意识形态效果之一”，“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公开责难政治主体性以及历史‘事件’的作用”。（沃林，第175页）为了克服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困局，当代西方激进左翼通过对结构作为“本体论常量”的反思，发现了结构中的裂缝和裂隙——事件，并突出强调了事件所能开启的新的存在。虽然他们的哲学更关注结构的裂缝、错位和例外，不再去构造同质化的本体论，但本体论并未完全被放逐。在他们看来，哲学仍然要通过先验质疑去把握和创造这个时代的新问题，重新思考一元与多元、断裂与连续、结构与主体等的关系问题，并通过“事件”这个概念提供对存在和主体的新理解。正如巴迪欧所说，“本体论的本质，就是要在对本体论的同一性的反思所遇到的失效中去推进本体论”。（巴迪欧，2018年，第16页）

巴迪欧系统地分析了事件与本体的关系。他认为传统哲学对本体论的思考都是要在“多”的显现中思考“一”的问题。但本体论所追求的“一”是反思的产物。“一”是将“多”通过计算、抽象而集聚起来的产物。这种“一”作为结果往往无法彻底解决“多”的问题，总会有无法被计算的多的残余存在。面对它们，同一性和连贯性的原则无法贯彻到底，本体论似乎失效了。巴迪欧将这一难点概括为“在呈现中，存在之为存在可以被理性地谈及的困难以及计数为一的困难”。（同上，第38页）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巴迪欧不再在一与多的辩证综合中思考本体问题，而是要发现一与多的裂缝、连贯性与非连贯性的裂缝，发现被“计数为一”所遗忘的存在，即“乌有之存在”。“‘乌有’就是对这个无法想象的裂缝的命名，这是在作为结构的呈现与作为业已结构化的呈现的呈现之间，作为效果的一与作为运算的一之间，被展现出来的连贯性与作为将会被展现出来的不连贯性之间的一道裂缝”。（同上，第72-73页）这种“乌有之存在”就是巴迪欧对传统本体的颠覆和对新的本体的构建，他也把它称为“空”。“乌有之存在”或者“空”并不是不存在，并不是空空如也，它们恰恰是无法被计算的部分，无法被纳入计数规则或抽象规则的部分，其实它们的存在才是被遗忘的原初的存在。如果我们想要使“空”或“乌有之存在”显现出来，我们就必须打破传统的本体论，“让计数失效”（同上，第75页），从而使原有的结构或框架中无法显现的“空”显现出来。这种不具有连贯性、无法被计数的“空”的显现就是巴迪欧所说的事件。

事件的显现与事实有本质的区别，事件总是呈现于事件位或情势的某个点上。“不存在自然性事件，也不存在中性事件。在自然或中性情势中只有事实。在后一种情形下，事实和事件的区分建立在自然性或中性情势（它们的标准是整全的）和历史性情势（其位的实存的标准是具现的）的区分之上”。（同上，第222-223页）因为自然情势和中性情势是稳定的、实存的情势，事件不可能出现在这些情势之中，或者即使出现也会被消解掉，因此，事件的显现必须基于历史性情势来理解。虽然历史性的情势未必总是产生事件，事件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但作为断裂的事件是基于历史性的情势所展现的可能性之外的某种呈现。

齐泽克也把事件理解为与事实相对的不可预测的冗余，但与巴迪欧不同，齐泽克不是将事件置于

计数为一的“一”与“乌有之存在”的对立中，而是更多地在符号界与实在界的对立中理解它。事件是符号化的秩序所不能完全符号化的部分的显现，是实在界与现实的创伤性遭遇。事件的发生总是令人意外、使人震惊，改变了人们理解事物的符号框架，扰乱了日常生活的平衡。阿甘本则通过对耶稣审判这一事件的分析，将事件放在正常情境与例外状态、世俗与神圣的对立中来理解。事件的出现如同一道门槛，区分了原初未分化的世界和建立了各种区隔的世界，激发了潜在的矛盾，产生了错位和例外状态。虽然角度各有不同，但巴迪欧、齐泽克和阿甘本都把事件看成是在原初的秩序和场域上“打洞”——事件作为原初秩序的裂缝、裂隙，“阻止这种秩序的最终关闭或阻碍其平衡”。（齐泽克，2006年，第264页）

既然事件是秩序的溢出和断裂，是不能在原初体系中得到理解的那部分，尤其不能被象征秩序所整合，无法获得命名，那么我们如何能理解和把握事件呢？巴迪欧指出，“属于概念性构建的事件，在双重意义上，它只能通过预见其抽象形式来思考，它只能通过介入性实践【这个实践本身可以完全被思考清楚】的回溯来得到揭示”。（巴迪欧，2018年，第222页）齐泽克和巴迪欧有大体相同的观点，他也认为未命名的事件需要铭刻进新的话语之中来获得命名，需要通过话语框架的重构来获得其意义。“当某个言语行动的发生重构了整个场域，这个言语行动就成了一个事件”。（齐泽克，2016年，第163页）在他们看来，事件的命名需要主体的介入，回溯性地去看待它，并且将其把握成打破原初秩序的一种努力。只有将这种看似悖论性的情境肯定下来，从中发现内在的、新的可能性，主体才能理解事件的真实意义。所以，事件的命名过程同时也是主体回溯性地介入其中的过程。事件和主体的这种紧密关联使得事件不再是抽象的，而是和主体的行动密不可分的、生成性的、关系性的概念。

巴迪欧和齐泽克等人认为，作为与历史性情境和情势相关的突发的、偶然的事件之所以成为本体，是因为事件既是存在的对立面，又呼唤着新的存在，它在不可能性之中呈现出新的可能性。因此，事件具有本体意味，同真理密切相关。事件可以将旧秩序的内在矛盾揭示出来，使看似不可能的成为可能。“在巴迪欧看来，事件是一种被转化为必然性的偶然性（偶然的相遇或发生），也就是说，事件产生出一种普遍原则，这种原则呼唤着对于新秩序的忠诚与努力。”（同上，第212页）在巴迪欧和齐泽克看来，这是克服矛盾走向真理的过程，也是我们判别真事件和伪事件的标准。如果这个偶然的事件并不是为了改变秩序，而只是使秩序保持不变，那么这是伪事件；相反，如果这个事件指向普遍性，使秩序发生根本和彻底的变化，那么这就是一种真事件，具有本体论意义。真事件通过本体论上的裂隙开启了运动和生成，“作为一种非存在之存在的降临，在可见和不可见之间的降临”（巴迪欧，2018年，第227页），为打破旧秩序、建构看似不可能的新存在提供了可能。

当代西方激进左翼思想家们对事件的理解为我们呈现了思想和行动的新的可能空间。一方面，事件作为裂隙、断裂、错位，既是对结构化的本体的突破，又开启了真理。事件与存在的这种辩证关联有助于提供对辩证法和实践等概念的新理解。正如孙利天教授评价的那样，“唯物史观或实践的新唯物主义的‘物’是作为实践的感性物质活动，也许只有在这种物质性的活动中，才能真正超越内在意识的焦虑，超越唯心主义同一性哲学的精神牢笼。因此，当代欧洲左翼思想家们对事件本体、偶然、意外、可感的物质性差异和异质性的强调，可以在‘实践思维’中得到理解”。（孙利天）另一方面，当代西方激进左翼思想家们对事件的理解为他们批判当代资本主义永恒统治的神话提供了理论武器。齐泽克指出：“在资本主义内部，事物的不断变化正是为了使一切保持不变，而真正的事件将会转变这个关于变化的原则本身”。（齐泽克，2016年，第212页）事件作为裂隙和断裂不是指向对某个方面的修修补补，而是指向了对资本主义的整个框架和整个场域的本体论变革。

二、作为本体的爱

事件虽然可以作为结构的裂缝开启新的存在，但事件作为不可预测的多，究竟如何与主体相遇？主体是否能够打破结构的控制？主体和主体之间又如何通过事件集合起来？这就需要提供建构性的纽带，将主体与事件、主体与主体关联起来。巴迪欧、朗西埃和阿甘本等人认为我们必须看重主体作为身体和生命与情感、欲望、爱、力的内在关联，而不能仅仅将主体看成是理性的动物。爱、情感、情动在主体与事件、主体的相互影响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爱是一个生产性的本体，爱不仅可以使主体敢于冒险，保持对事件的忠诚，还可以使主体在与其他主体相遇时出于同情和义愤关联起来从而形成生产性的共同体。由此，当代西方激进左翼主张转向对情感与政治之间关系的重新思考，凸显爱在哲学和政治研究中的本体意义。

“爱对哲学和政治来说是一个核心概念，没有考察并发展这个概念是当代思想虚弱的一个关键原因。把爱留给牧师、诗人和精神分析师实属不智”。（哈特、奈格里，第141页）这种哲学和政治研究的情感转向不仅仅是重视人的感受、情感、爱，以此来解释人们行为的原动力，更重要的是寻求一种沟通他人、关爱他人、建立同伴关系的新的纽带，使人们展开集体行动，反抗旧秩序建立新秩序。这样，爱就成了一种通向共同性并产生新的存在的力量。

当代西方激进左翼的思想家们或者借助亚里士多德关于友爱的思想资源来重新思考友爱政治学，或者借助斯宾诺莎关于情感、情动的论述重新思考人的社会性。他们通过不同侧面的研究阐释这种“情感的转向”，力图克服对爱的实用主义、怀疑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解读，重新激活相遇、共享、创造等概念，为多元主体的政治联合及他们的集体行动提供动力。如朗西埃主张通过对可感物的重新分配来实现平等；哈特和奈格里主张通过爱的生产和共同性的生产来突破旧秩序、创造新秩序；阿甘本把友爱看成“在存在的感觉内部‘共感’到朋友的存在”（阿甘本，2017年，第40页）；巴迪欧则把爱看作和科学、艺术、政治并列的一种真理程序，“这种真理简单说来，就是关于‘两’的真理，关于如其所是的差异的真理”。（巴迪欧，2012年，第71页）

虽然他们的观点各有差异，但他们都认为爱与哲学紧密相关。爱和事件相似，同样要解决一和多、同一与差异的关系等本体论问题。在他们看来，不管是朋友之爱还是两性之爱，爱都是通向“两”而不是“一”的过程，即都是珍视异质性而不是走向同一性的过程。爱和事件一样，不能被“计数为一”。因为“同一性和统一化会扼杀创造性，只有重复，没有差异。我们应该将爱理解为奇异性在共同性中的相遇和实验，继而生产出新的共同性和新的奇异性”。（哈特、奈格里，第145页）通过对差异的尊重和爱，主体才能超越自身的孤立的眼界，去主体化和去中心化，重新体验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以及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世界可以通过一种不同于孤独的个体意识的另一种方式来遭遇和体验”。（巴迪欧，2012年，第72页）这种体验使得个体能够透过爱的偶然性获得对差异和共同关系的新理解，并在爱的行动中不断创造出共同性和对共同性的新感受。

对爱的这种理解也把爱和政治关联了起来。爱是基于差异性基础上的共同性的创造，这一点正是政治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的原初含义，也是友爱比正义更为根本的原因。人类通过互助合作结合起来是为了过一种更好的生活，“这种共同生活的界定标准不是对某个共同实体的参与，而是一种纯粹存在式的分享，一种可以说没有客体的共同—分割：这就是友爱，也即对存在这个纯粹事实的共感”。（阿甘本，2017年，第44页）这种“共感”使得爱成了人与人之间结成同伴关系的内在纽带。但这种源自共同生活和分享美好生活的“共感”在西方政治生活中却蜕变成了理性“共识”，技术化的操作和理性的计算使人们遗忘了友爱意义上对存在的共享，忘却了共同体的真正内涵，无法使人们

“确证生命的生命力、能量及创造的生气”。(索迪瑞,第169页)

如何恢复爱的本体维度?如何让差异化的、原子化的个人重新创造政治的共同性?答案是对爱的不断唤醒和激发。哈特和奈格里认为,爱不是一成不变的,爱也可能腐化。我们要不断唤醒爱,特别是要从非物质生产中、从生命自身的自主性出发,寻求克服生命权力的途径。爱可以和力结合起来对抗恶,并能激起人们的义愤、不服从等情感,从而突破财富共和国的统治,实现新的共同体。由此,爱可以成为通向新存在的力量。“爱是一个本体论事件,它标志着与现存物的断裂以及新事物的创生。存在由爱所构成”。(哈特、奈格里,第142页)巴迪欧也认为,主体与爱的相遇不是一次性的,爱需要不断宣告,而主体需要在爱中冒险,不断指向创造。“严格说来,爱不是一种可能性,而勿宁是一种超越,超越那看似不可能的事物。某种貌似没有理由存在并且没有任何出现可能性的东西,竟然存在”。(巴迪欧,2012年,第97页)爱能够在存在的裂缝中开创出新的存在,爱是达到新存在的艰苦劳作和共同体验,因而爱具有了超越性和战斗性。在这个意义上,爱也可被视为事件,爱的出现不可预测,打破了原有的秩序和平衡。爱和事件同样作为对现实的介入和命名,以批判的方式凸显主体的自由和新的现实的生成,展现其本体的维度。只不过事件更强调本体的断裂和裂隙,而爱作为纽带则主要是通过对同情和感性平等的呼唤,将原子化的个体联结起来推翻资本的统治从而创造新存在和新的共同性。

三、缩减的本体论：当代西方激进左翼本体论承诺的实质

当代西方激进左翼通过对本体与事件、理性与情感等关系的探讨,将事件和爱承诺为本体来重新理解新的存在何以可能,其目的是超越原初秩序和理性计算的法则,将本体和主体奠基于结构的裂隙和裂缝来理解不可化约的多。这种对本体的理解和传统的本体论追求有哪些差异?事件和爱作为本体概念究竟如何影响政治主体和政治策略?

当代西方激进左翼的思想家们不再思考万物如何统一的问题,也不再承诺何物存在,他们关注的基本问题是“全新的存在何以可能”,目的是驳斥“否定式存有论”,即“就其时代而言没有可能者即不可能。不可能者则没有可能曾经存在”。(朗西埃,第170页)他们通过对事件和爱的本体论承诺重新探讨了一元与多元、差异与统一、连续与断裂、偶然与必然的边界,致力于解决看似不可能的存在何以可能、不可见的部分如何可见、偶然的的东西如何成为必然、差异化的存在何以建构共同性等核心问题。

在本体论上,他们试图既反对绝对同一的形而上学本体,又避免陷入相对主义。一方面,他们拒斥传统哲学所追求的绝对同一的本体,以避免发生共同性的腐化和形而上学的暴政。他们往往把哲学的中心范畴说成是“空”“空洞的能指”“空虚的完满”等。这种“空”不能被哲学填满,正是这种“空”的存在才使哲学健康发展。任何填满这种“空”的努力,或者说追求理想性的、永恒性的终极存在的实体,都会陷入一种理想的狂妄或迷狂之中,无法处理好一元和多元的关系,“当它将自己想像成为一种生产性的真理时,哲学放弃了自己的节制,即哲学本身的批判性价值。它成为了一种悲惨的指令,一种蒙昧和暴政式的命令”。(巴迪欧,2014年,第103页)因此,他们要终结传统的形而上学,瓦解实体化的本体,他们或者将“一”看作计算或运作的产物,或者将“一”理解为对剩余的局部限制和固定。

另一方面,他们又竭力避免在批判同一性中像后现代主义那样走向相对主义。他们不是完全放弃了本体,而是在本体论的断裂和空白之处重新发现了具有本体意味的概念——事件和爱,并以此来重启哲学。他们在承认异质性的基础上寻求爱的共同性,在特殊与普遍的关系中重新思考激进的普遍

性。他们所寻求的共同性和普遍性不是中立的，而是从裂缝和空无中不断生成的、开放的、超越的存在，是由不能被算入的“无分之分”者打破结构重新确立和生产出来的。因此，当代西方激进左翼的思想家们力图通过本体论重构来打破封闭的本体论体系，以事件和爱开启新的可能性，为看似不可能的新存在的诞生提供哲学上的辩护和说明。巴迪欧将这种介入概括为“关键在于要开始对行动的现实以及这个论题的根基进行漫长的批判：在存在中，存在着新”。（巴迪欧，2018年，第261页）

当代西方激进左翼思想家们所承诺的本体的生成性、异质性、超越性的特点也激发了他们一系列激进的政治想象。他们对事件与爱的研究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阐述，而是要为他们对政治主体和政治策略的批判性解读提供深层的本体论基础。对传统本体论的批判使他们同样反对理性的、透明的主体，反对预定的或先验保证的主体，但面对“主体之死”，他们又竭力挽救主体，使主体获得一席之地。主体就产生于事件和爱所开启的存在的裂隙之中，作为不被算入的部分通过对事件和爱的信念以及打破连贯性结构的行动，使自己成为真正的主体。相应地，事件和爱也离不开主体，它们本身就是主体作用的产物。主体和本体的这种相互成就体现的就是阿甘本所说的“存在和人的共同归属和相互具有”。（阿甘本，2018年，第93页）这种本体论上的新理解无疑会为主体的行动开辟新空间，同时也会深化我们对主体和存在之间关系的理解。

巴迪欧基于主体与事件的不可分特别强调主体对事件的介入和忠诚，以此来唤醒主体和真理的关联。在他看来，“主体化，在溢出中和一种未知的运算中谜一般的名称的扭结点，就是在情势之中追溯了真理的生成性的多，从事件激发了空的非实存的点出发，并将自身置于空与自身之间”。（巴迪欧，2018年，第486页）哈特和奈格里通过爱 and 力的结合强调诸众可以采取出走、逃离、逾越等策略。在他们看来，事件与爱可以激发主体、塑造主体，将主体凝聚起来，使他们敢于冒险，勇于挑战。如果没有事件打破铁板一块的封闭本体，没有爱对共同性的不断创造，那么主体的集体行动就成为不可能，当然也就无法开启新的存在。因此，事件和爱可以在本体的裂隙和错位中为主体的存在及主体反抗资本主义的彻底行动提供可能的空间，为我们提供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激进想象。

当代西方激进左翼的本体论重构也有其困境，呈现出批判性有余而建构性不足的特点。他们力图“打破作为对肯定世界描述的本体论之自我封闭领域”（齐泽克，2006年，第198页），以激进政治和介入现实的方式来呼唤主体的超越性和创造性，表达了他们对看似不可能的新存在的渴求和信念。但是，他们过多地强调了本体层面的不连贯性和间断性，以事件和爱来打破封闭的结构和秩序的观点凸显了他们在建构普遍性和共同性维度上的匮乏。将事件与爱承诺为本体固然可以给人们带来打破结构化僵局希望，但并不能给人们提供切实地摆脱原有秩序和框架的有力武器和现实道路。

譬如巴迪欧虽然以集合论的方式来重建本体论，力图超越海德格尔以来对数学和技术等的批判，重新理解一和多的关系，但他始终强调事件的本质是不可确定的，这使得他的本体论存在着悖论。“在被界定为‘一所架构的存在’的经典形而上学面前，巴迪欧决定，本体论只可能是未分化的、不连贯的多元的理论，它彻底地从一的力量之下抽离出来”。（林格，第65页）因此，他的本体论只能是一个“缩减的本体论”（同上）。又如哈特、奈格里等人以爱、情感等作为事物断裂和创生的本体论概念，其问题是，爱虽然能和力结合使诸众团结起来，但难以有效地处理和他者的对抗，难免会陷入政治的浪漫主义。再者，事件与爱虽然可以激发主体，但无论是主体与事件的关系还是主体与爱的关联都依赖于相遇。偶然的相遇和对主体忠诚的呼唤使得主体的浮现只能成为“空与自身之间”的有限的浮现，无法从根本上动摇结构化的秩序和设置。这也使得他们在处理主体与事件的关系时出现了循环解释“主体服务于事件的忠诚，但事件本身只有作为一个已参与的主体者才是可见的”。（齐泽克，2006年，第165页）这种理解虽然在本体的显现上凸显了主体的介入，但也使得事件作为本

体仅仅仰赖主体的介入；同样，主体的介入使事件获得命名，但主体的作用也仅仅剩下了有限的决断和对事件的忠诚。这使得主体的激进政治行为蜕变成了伦理选择。

总之，当代西方激进左翼的思想家们虽然力图提供一种新的本体论承诺，并通过事件和爱的概念来建构能动的本体和超越的本体，提供人和存在的相互归属的新理解，但“缩减的本体论”和爱的浪漫化倾向仍然使得本体的重构困难重重，无法有效处理好一元与多元、特殊与普遍、偶然与必然、间断与连续的关系。虽然他们力图通过对事件和爱的强调催生打破资本主义结构化秩序的新存在，但孤注一掷的宣告和忠诚于事件的稀缺主体又使得这种新存在的产生完全依赖于机遇或奇迹。因此，他们需要进一步反思自身本体论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弥合本体层面的批判与具体秩序层面的行动之间的裂缝，避免事件的神秘化和爱的浪漫化倾向，从而真正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和创立新存在奠定坚实的根基。

参考文献

- 阿甘本，2017年《论友爱》，刘耀辉、尉光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18年《奇遇》，尉光吉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巴迪欧，2012年《爱的多重奏》，邓刚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14年《哲学宣言》，蓝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 2018年《存在与事件》，蓝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 巴迪欧、齐泽克，2017年《当下的哲学》，蓝江、吴冠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 哈特、奈格里，2015年《大同世界》，王行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朗西埃，2015年《歧义：政治与哲学》，刘纪蕙、林淑芬、陈克伦、薛熙平译，西北大学出版社。
- 林格，2016年《本体论》，载《巴迪欧：关键概念》，巴特雷、克莱门斯编，蓝江译，重庆大学出版社。
- 齐泽克，2006年《敏感的主体——政治本体论的缺席中心》，应奇、陈丽微、孟军、李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 2016年《事件》，王师译，上海文艺出版社。
- 孙利天，2018年《“实践思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探索》，载《中国社会科学报》6月28日。
- 索迪瑞，2018年《生成—女人》，载《德勒兹：关键概念》，斯蒂瓦尔编，田延译，重庆大学出版社。
- 沃林，2017年《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董树宝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 尹树广，2019年《存在论与伦理学——西方激进左翼政治哲学理论的基础问题》，载《国外理论动态》第5期。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哲学院）

责任编辑：韩蒙